

書評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指引

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

(2nd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by Falk Pingel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0, 83 pp.

ISBN 978-92-3-104141-9



周珮儀、鍾怡靜

壹、前言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主張教科書的研究與修訂可以增進國際理解, 促進世界和平, 因此致力推動國際教科書研究。它曾召集多次國際教科書研究的研討會、兩國和多國教科書修訂諮詢會議, 特別著重歷史、社會和地理等科目的教科書研究。1991 年 UNESCO 在澳洲布里斯本 (Brisbane) 召開國際性專家會議, 定義修訂教科書、課程和教材的規準, 會中決議請 UNESCO 建立國際性、區域性和國家性的網路, 促進國際教科書研究, 決議由 Georg Eckert 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GEI) 創立 UNESCO 的國際教科書研究網路 (周珮儀、鄭明長, 2008)。本書作者 Falk Pingel 是 GEI 前任的副主任, 也是國際教科書研究的重要學者, 本人於 2010

周珮儀,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E-mail: peii@mail.nsysu.edu.tw

鍾怡靜,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年獲 GEI 獎助至該中心進行短期研究，曾與 Pingel 討論《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指引》(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 (周珮儀，2011)。

雖然國際教科書研究是 UNESCO 和 GEI 長期推動的重要任務，但是一直缺乏精確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論；直到 1997 年 UNESCO 委託 Pingel 發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指引》英文簡版和法文版，1999 年再出版英文完整版，國際教科書的比較研究和修訂才有具體的參考。之後的十幾年，有許多教育專家，包括研究者、教科書作者、教師或者課程與教材開發商，將本書運用在資料分析、比較和開發教育媒體上，為教科書和課程修訂提供有用的工具；特別是對那些過去缺乏教科書研究傳統的國家，像是東歐在千禧年進行教科書改革，本書就適時提供了系統性的指引。

近年來，網路與電子教育媒體市場的快速發展，使得教科書在教室所扮演的角色產生變化。此外，UNESCO 推展「全民品質教育」，在 2005 年將工作重心放在教科書開發和修訂，協助會員國制定教科書和其他學習材料的相關政策、規範和標準，藉以提升教育素質。為了因應教育品質標準和教育媒體的新趨勢，本書亦在 2010 年進行修訂。

貳、內容摘要

本書在緒論開宗明義指出：「教科書是促進國際理解的工具。」(Pingel, 2010: 7) UNESCO 之所以強調國際教科書研究，是因為教科書是教育最重要的一環，教科書內容反映了國家文化的基本思想，但也常是文化鬥爭和爭論的引爆點，特別是社會科目更是敏感，它無法避免在教學中引入價值判斷；因此 GEI 將國際教科書研究的焦點放在社會科，強調社會科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論辯、評鑑的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確定教科書的設計要實現何種目標；歷史、地理和公民教科書不只是反映社

會現實和社會規範，更要涵蓋教育與民主、人權和國際化，以及跨文化意識。爲了要促進國際理解，國際教科書研究人員希望修正過去教科書中對不同文化、宗教或民族優越感的偏見。本書建議透過跨國教科書研究和教科書修訂方案，分析教科書本身，並對教科書中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協商，確定雙方可以達成的共識。

全書共分爲六章，以下簡要介紹各章主要內容。第一章介紹推動國際教科書研究和教科書修訂的時代背景，這主要是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 UNESCO 的成就。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聯盟呼籲：各國應該將教科書內容修訂提升到國際層級。當時在政治界和教育界都有許多人主張：教科書應該提供適當的內容，不要讓民族偏見的描繪誤導人們走向戰爭。國際聯盟開始尋求各國的合作，希望各國進行教科書修訂，避免各國教科書充斥著仇外心理和成見。然而，各國政府對此缺乏意願而不願對修訂教科書負責。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這一切暫告一個段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顯示政治的破壞力遠大於教育政策談判所希望達成的和平導向，然而，戰後 UNESCO 的創始成員仍堅持：對於過去國際聯盟推動的教科書修訂工作應該加以延續擴展。在 1946 年 UNESCO 第一次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建立發展國際理解的教科書和教材修訂方案，並在 1949 年發展相關手冊。雖然當時這些方案往往對教科書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過度樂觀，實際焦點也仍然在國家而非全球的議題，超過預期的時間和經費支出也使其在實行上打了折扣，但是隨後幾年，UNESCO 展開具體行動，舉辦相關研討會，鼓勵會員國應更廣泛地交流教科書內容，尤其是歷史和地理教科書，並應酌情透過雙邊與多邊協議，相互學習和修訂教科書與其他學習材料，以確保內容隨時更新及不帶偏見，並增進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理解。

近年來多元文化和品質教育成爲 UNESCO 國際教科書研究與修訂的主軸。UNESCO（2006）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跨文化教育指

南》(UNESCO Guidelines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指出：在世界各地，教室中的組成份子都日趨多元，因此對不同文化傳統的理解已成為教育的要務。雖然多元民族的社會已經不是一種新現象，但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意識到：過去偏向單一族群的主流文化，必須因應當前文化或族群的多樣性與跨界的人口流動，改變傳統的刻板印象並促進不同文化的理解。新社會分界線的關鍵在於文化差異，而非舊社會的階級劃分。因應 Huntington (1998) 提出「文明衝突」，UNESCO (2006) 開始宣傳和平文化的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塞內加爾的世界教育論壇發表的《全民教育達卡行動架構》(Education for All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這個架構希望協助各國政府為全民提供良好品質的基本教育，它的教育目標與國際理解和人權教育息息相關。為了透過教科書和教材提升品質教育，UNESCO 發表了《透過教科書和學習媒體提升品質教育綱要》(Guidelines for Enhancing Quality Education through Textbooks and Learning Media)，協助出版者、課程發展者和教師。此外，在 2005 年的《教科書和教材綜合策略》(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extbooks and Learning Media) 也說明 UNESCO 的角色是協助會員國發展促進品質教育的教科書和教材，並規劃相關政策、規範和標準；建議各國對教科書內容深度分析，包括教科書的一般架構，像是：文本、圖片、作業等，並因應當地特殊需求調整全民品質教育，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具體方案。《教科書和教材綜合策略》將高品質的教材發展和國際教科書修訂結合，強調透過研究改善教育品質和提升多邊教科書修訂方案的效能。這項工作強調教科書研究和教科書修訂的方法論，並呼籲要更重視影響教材品質的外部因素，像是市場和傳播型態。

第二章探討兩國或多國如何透過教科書協商方案達成和解。早期國際教科書比較主要是查明與消除錯誤的事實和明顯的偏見，主要任務是分析教科書、比較發現結果和相關學術研究連結，最後列出沒有處理的議題和未被接受的觀點，提出正向關係的建議。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國際

教科書修訂採取「共識模式」(consensus model)，認為透過比較不同國家教科書中不同或衝突的描繪有助雙方達成和解。因此在教科書協商方案中，協商各方往往重視現有的相同點而非差異點，然而各方沒共識的主題經常被忽略，社會大眾也無從了解這些不同的觀點。雖然「共識模式」有其侷限，但是也有相當成果，像美國—加拿大、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以色列等都透過雙邊教科書內容的比較進行教科書修訂。這些成果迄今仍充滿啓示：無論雙方政治和意識型態背景如何分歧，都可以建立教科書呈現最基本的標準——就是教科書要從彼此社會的角度撰寫，包含：事實的正確性、平衡的內容選擇、對有關價值的主題不帶偏見的陳述。

1990 年代之後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教科書協商的焦點有所轉變：從對過去歷史的爭議，轉向對現在重大衝突的開放辯論；從國家之間的衝突，轉向國家或社會之內族群的衝突。除了個別國家，也有許多促進和平的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市民社會的專家團體和機構，對教科書研究和修訂感到興趣而參與教科書協商，甚至逐漸取代之前官方性質的協商：這雖然擴大參與，但其主要缺點是不如之前政府主導的協商有充裕資金，以及對學校課程與教科書實質的影響力。因此，各種模式的平衡和介入力量的互動，對教科書修訂有很大的影響。

第三章針對如何實施國際教科書比較方案，提出方法和實施層面的指引，探討如何從發展概念、設計、實施、發現和傳播，執行國際教科書研究方案的歷程。

首先第一步是設立研究小組；國際教科書比較不只是學術性的教育研討會，更重要的成果在於對正式課程的實際影響。一開始最好先建立和教育部門、教科書作者和出版商的聯繫，諮詢教師、研究人員或政府機關是否有必要比較本國與他國教科書，找到適合的參與人員和機構，例如：UNESCO 的國際教科書研究網絡就提供國際教科書研究人才和機構的線上資料庫。

接下來要分析影響教科書撰寫的背景因素，教科書研究必須考慮課程的背景和課程在教學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如何進行課程設計？一般教育目標或特定目標為何？是否區分必修和選修的課程主題？哪個年級該教什麼內容？教科書內容審查需要多久？哪些機構或人員負責課程改革？教師容易取得補充教材或完全依賴教科書？教科書涵蓋整個科目嗎？教科書是唯一的教學媒體或只是其中一項？

下一步是教科書分析應用的方法，要先決定樣本，也就是決定研究的教科書數量和型態，界定足以產生推論的適當教科書樣本。接下來是進行分析，一般而言教科書分析可從兩個方向著手：1.教學分析：探討文字背後的教學意涵，通常教師會比較關心這個議題；2.內容分析，探討文本本身的意義，例如是否與學術研究一致，是否充分涵蓋探討的主題？通常學科專家會比較關心這個議題。教科書比較會議可以提供教師和學者專家討論和應用的機會；學者、出版商和作者必須熟悉教師的需要，雙方也要進行對話，克服研究者和教師的差距。教科書分析也要考慮出版商資金成本會影響教科書設計、頁數和印刷品質。

接下來是從蒐集事實到詮釋分析，教科書中有許多部分並非事實，為了避免僵持不下、不一致的意見造成爭議，教科書分析結果應該與相關學術研究進行比較，這有助發現教科書作者選擇教材的標準和教科書解釋運用的原則和模式。最後是撰寫和發表研究成果。結案報告要包括研究主題和方法，找出忽略的項目和討論爭議性議題，以及建議如何改進教科書。

本章也提醒我們：國際教科書修訂正朝向多元文化觀發展，過去根深蒂固的官方撰寫方式，往往掩蓋了不同詮釋角度的歷史記憶。然而，國際教科書研究與修訂的取向正在改變；例如：歷史從一種需要記憶的知識體的累積，朝向一種理性地探究過去的歷程，基於不同觀點蒐集各種證據，來進行推論；這可能會對學生的價值觀產生相當不同的影響。因此，國際教科書修訂已經發展成爲一門科學的學科——本書稱之爲「教

科書研究」，透過科際整合，例如：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的參與和合作，對於歷史、地理和公民教科書與教學，以及由大眾媒體和政治文化傳遞到學生日常經驗的偏見和誤解，提供最佳的洞察力。

第四章探討新的數位媒體對教科書的挑戰。現今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到廣泛的電子媒體。除了印刷教材，電子媒體提供更多種類的學習素材以豐富教學內容，使得教學工具擴展到更為廣泛的「教育媒體」。

這使得教科書設計時圖表與文字同等重要。在過去歷史教科書著重文字敘述，地理教科書則描述國家或區域地理特徵，但現今教科書設計已發生很大變化，教科書內容中充滿了圖片、地圖、漫畫，越來越多的兒童暴露於電視、影音，圖表比書面文本更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成為幫助記憶的關鍵。因此圖表功能就變得很重要，教科書設計和分析時必須注意圖表內容是否增加新的觀點？圖文能否配合？

新媒體改變了學習環境，學生在互動網路中可以依照自己的「腳本」(scripts) 獨自或與同儕對話進行學習活動，而不必基於文本主導的深度的歷史或地理的理解。這種學習情況往往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結合，有助於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方式。然而，這可能衍生一個問題：教科書為主要教育工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嗎？對此作者歸納專家意見，認為新媒體不會取代教科書。儘管各國政府支持發展電子學習教材，但電子媒體與教科書是相輔相成的。教師經常使用電子媒體材料演示教學，而非讓學生將它當成主動學習的工具，研究也證實了教科書仍然是最可靠的學習工具。教師和教育當局必須面對新電子媒體的挑戰：學生透過互動網路瀏覽可以找到比教科書更多的資訊來源、圖片和其他老師不熟悉的資料，但是在領域知識和學習技能方面也可能有更多功能性文盲，使得數位落差的鴻溝更加明顯。此外，新的媒體也可能同樣存在舊的紙本教科書的偏見，或是新媒體本身偏差的影像呈現與意識型態，因此必須加以批判檢視。儘管如此，全面了解新媒體，讓學生有機

會接觸是必要的。對於國際教科書研究而言，重要的是這些新的電子媒體如何成爲促進國際理解的工具，我們迫切需要發展一套國際性的標準，透過這些標準選擇適合教導國際理解的教育媒體。

第五章分析教科書研究國際合作的發展和前景。最近有許多研究證實目前全世界的學校教育正朝向標準化，包括：科目與其授課時數、教材和正式測驗的標準化。國際測驗，例如：國際學生評估方案（PISA）、第三次國際數學和科學研究（TIMSS）、國際教育成就評估協會（IEA）、公民教育研究（CivED），都是基於這種標準化趨勢所形成的測驗，並反過來增強標準化趨勢。所有參與這些評比的國家都認爲這種測驗可以正確評比他們國家的教育品質，然而這些測驗所關心的都是所謂「核心」的學科，例如：自然科學、數學和語言、其他文學、公民和宗教等與價值有關的科目，比較難建立一個共同的核心內容，在國家課程的重要性就大爲不同。儘管如此，從跨國的教育資訊進行國際比較，有助各國對彼此教育的了解，因此仍然值得肯定。

過去的教科書出版商往往在自己的國家中運作，全球化的趨勢迫使越來越多國家的出版商尋求國際合作夥伴，冷戰結束和共產社會的垮台更增強這種趨勢。從成本考量而言，教科書發展，例如繪製地圖、更新統計、研究分析等，都需要大量資金，但現在藉由電子媒體的幫助，這些學習內容可以輕易調整以適應不同國家和語言而節省成本，也促使這個領域的國際合作更加頻繁。然而，這種跨國的教科書資訊交流是否都是單面向地導向一致呢？本書提醒我們，可以透過國際組織和發展中國家地方教育當局的跨越國界合作，抗拒全球市場的大型出版公司的主導，挑戰教科書走向統一和標準化的趨勢而維持多樣性。

最後，本章強調透過教科書培育全球責任感。國際教科書比較使得教科書發展時不只考慮當地和國家的層面，也能考慮全球的層面。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並非是單面向地反映社會，透過教科書培育世界和平和相互理解的態度和觀點，將有助社會朝向更好的方向。

第六章介紹國際教科書研究機構和 UNESCO 的國際教科書研究網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歷史學家 Georg Eckert（後來成為德國在 UNESCO 的代表）在 Braunschweig 教育大學與外國歷史教師合作，在德國與鄰近或之前的敵對國家之間舉辦許多教科書會議，進行教科書比較分析和修訂，藉以消除教科書中的偏見和扭曲的民族形象。1951 年他創立「教科書改進國際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xtbook Improvement），在他逝世後為紀念他改名為 Georg Eckert 國際教科書研究所，執行與 UNESCO 合作的國際教科書研究計畫。GEI 的研究成果成為世界各地學習的典範，並獲得多項獎勵肯定。它是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認可的教科書中心，它在 1985 年獲得 UNESCO 和平獎。GEI 透過教育理論和實務界的合作，對世界各地（特別是歐陸地區）的教科書作者和教師提供教科書研究的相關理念與建議。

從早期 GEI 就致力於探討在教科書歷史中面臨困境的人們，以及如何與過去的錯誤達成協議。它有許多國際教科書協商的專家學者，協助彼此有衝突的國家達成教科書協議。近數十年 GEI 致力推動雙邊國家的教科書會議，邀請雙方的研究人員、教科書出版者、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員參與會議討論，希望能夠降低教科書中的偏見和歧視，並透過教科書的研討促進不同國家的相互理解，進而促進世界和平。在 GEI 主導下，歐洲國家簽訂許多教科書的協議，例如：1951 年「歐洲歷史爭議性議題的法國—德國協定」、1976 年出版「德國—波蘭歷史和地理教科書建議」、1985 年出版「德國—以色列教科書建議」等。

UNESCO 委託 GEI 為研究機構和課程發展中心成立國際網絡，交流有關和平、民主和人權的課程、教科書和師資培育新資訊。這個網絡的資料庫統整在 GEI 入口的「教育媒體研究」，¹它蒐集了正在從事教科書研究的計畫、機構和學者，也提供有關教育系統、課程和教科書的研究論文和資料庫，特別是社會科；並可連結到 UNESCO 首頁。這個教

¹ <http://www.edumeres.net>

科書研究網絡是一個交換意見、傳播知識的媒介，特別是許多國家教科書研究資金有限，網路的資訊交流可提供替代性的選擇，有助推動和平和人權的教育。

參、評析

本書主要是作者在 GEI 工作多年，參與 UNESCO 的國際教科書研究與修訂實務工作經驗角度來撰寫，因此閱讀本書時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本書雖然也強調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性，但事實上比較重視實務經驗和實際成果，也就是重視「教科書修訂」勝過「教科書研究」。正如 Nicholls (2003) 對本書的批判：這是一本「指引」，但是對教科書研究者如何分析文本並未提供充分的「指引」，Pingel 應該提供更多具體範例來說明這些方法和程序如何進行；惟有系統性發展的架構和工具，才能確保高品質的教科書研究。當然本書透過 UNESCO 的工作對於過去缺乏教科書研究的開發中國家提供了指引與協助，但是臺灣近年來的教科書研究蓬勃發展，也開始有教科書研究的專門刊物和研究中心，教科書研究方法亦日趨明確嚴謹，對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可能會覺得本書有關方法論的部分不夠明確，而偏向從實務經驗中累積的注意事項。然而，臺灣的教科書研究往往只著重學術研究層面，眾多研究成果能回饋到實際的教科書修訂仍然有限，如何強化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兩者之間的聯繫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第二，本書的主題是國際教科書研究，這個領域對我國教科書研究仍然相當陌生，雖然近年來我國教科書研究與日俱增，但是多數研究是在對我國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進行不同國家的教科書比較研究仍不多，對於國際教科書研究的潮流和國際組織推動教科書修訂的緣由和工作內容也缺乏了解；因此本書的引介將有助我國教育界對國際教科書研究有更多了解，尤其是在教科書政策方面更可形成教科書修訂與改革的動力。

肆、結語

整體而言，本書對我國教科書研究具有理念和實務雙方面的價值。在理念啓發方面，國際教科書比較提醒我們：教科書發展時不只考慮本土和國家的層面，也要考慮全球的層面；除了培育國家公民，也要培育全球公民；除了適應現狀，也要創造未來；除了是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更要成爲消弭偏見、化解衝突、增進國際理解、促進世界和平的工具。

在實務建議方面，本書認爲國際教科書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爲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透過國際教科書研究方案或諮詢會議的協商和和解，對參與各方的教科書修訂達成實質的建議。本書具體說明兩國或多國如何透過教科書協商方案達成和解以及實際進行的步驟，列舉相關資源、網絡和範例。呼應國際教科書研究的趨勢，建議未來政府當局在教科書修訂時，能運用這些研究、資源、網絡和範例，召開雙邊或多邊教科書會議，邀請各國的教科書研究人員、出版者、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員，也可邀請 UNESCO 和 GEI 協助，針對共同的歷史或議題進行研討，透過他人的眼光和心靈來看世界，促進相互理解，簽訂相關協議進行雙邊或多邊教科書發展的對話與修訂。綜合言之，教科書修訂不只要考慮本土和國家的層面，也要考慮全球的層面，透過研究發展「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教科書。

參考文獻

- 周珮儀 (2005)。我國教科書研究的分析：1979-2004。《課程與教學季刊》，8 (4)，91-116。
- 周珮儀 (2011)。促進國際理解和交流的教科書研究之旅：GEI 短期研究心得。《教科書研究》，4 (1)，139-143。
- 周珮儀、鄭明長 (2008)。教科書研究方法論之探究。《課程與教學季刊》，11 (1)，193-222。
- Huntington, S. P. (1998).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Nicholls, J. (2003). Methods in school textbook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3(2). Retrieved from <http://centres.exeter.ac.uk/historyresource/journal6/nichollsrev.pdf>
- Pingel, F. (2010). *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 (2nd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6). *Education for all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framework.shtml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6). *UNESCO guidelines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98/119823e.pdf>